

旺王  
著喜

ZHENGZHIIJAXING JIAOYUJIA  
DE SHENGCHENG JIZHI  
YI ZHANGZHDONG WEI GEAN DE QUANSHI

# 政治家型教育家 的生成机制 以张之洞为个案的诠释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旺王  
著喜

ZHENGZHIIJAXING JIAOYUJIA  
DE SHENGCHENG JIZHI  
YI ZHANGZHIDONG WEI GEAN DE QUANSHI

# 政治家型教育家 的生成机制

以张之洞为个案的诠释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18 · 北京

- 声 明 1.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  
2. 如有缺页、倒装问题，由出版社负责退换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生成机制：以张之洞为个案的诠释 / 王喜旺著. —北京：  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8. 11  
ISBN 978-7-5620-8717-5

I. ①政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张之洞 (1837-1909) —人物研究 ②张之洞  
(1837-1909) —教育思想—研究 IV. ①K827=52 ②G40-092. 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267620号

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

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

网 址 <http://www.cuplpress.com> (网络实名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)

电 话 010-58908289(编辑部) 58908334(邮购部)

承 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22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2.00 元



### 王喜旺

男，汉族，山西孟县人，生于1970年2月。教育学博士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现供职于河北大学教育学院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、中国现代大学史、教育文化学。迄今为止，出版学术专著3部，发表论文40余篇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、教育部重点项目1项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项，获得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、三等奖2项，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、三等奖1项。

# 目 录

CONTENTS

## 引 言 / 001

## 第一章 教育家人格：献身教育事业的不竭动力 / 002

第一节 对教育事业的挚爱 / 002

第二节 超越世俗功利的情怀 / 023

第三节 对学生的仁爱之心 / 028

## 第二章 权变智慧：搭建长袖善舞空间的利器 / 037

第一节 从“清流”名士到“洋务”健将的应变之策 / 037

第二节 变革科举的策略选择 / 048

第三节 《劝学篇》出炉的抉择与考量 / 053

第四节 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》出笼中的审慎权衡 / 058

## 第三章 专业素养与道德操守：凝聚同仁的纽带 / 069

第一节 公认的“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” / 069

第二节 慎独君子与清廉督抚 / 071

第三节 刚劲风骨与勇于任事 / 073



## 第四章 创新性思想体系指引下的教育实践：塑造现实的关键力量 / 099

第一节 融汇中西的文化图式与教育蓝本 / 099

第二节 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》：《劝学篇》中教育蓝本的续写 / 123

第三节 湖北实验的展开与新学制的厘定 / 133

第四节 西式学堂创办的不断完善 / 145

第五节 对废除科举制的勉力推动 / 156

第六节 创设存古学堂的深谋远虑 / 167

## 第五章 政治家型教育家生成的时间逻辑 / 184

第一节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素质奠定 / 184

第二节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思想初步形成 / 189

第三节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思想体系完善 / 200

第四节 政治家型教育家的社会影响扩大化 / 219

结语 / 269

参考文献 / 276

后记 / 285

## 引言

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张之洞是一个集政治家、教育家等角色于一身的伟大人物。对于这样的人物，如果选择一个适当的称谓来指称他，那只能是政治家型教育家。作为政治家型教育家，其主要特征是：具有政治家的全局眼光，善于把教育置于整个社会中来思考、实践；具有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气度，能够对教育进行超前思考、长期规划；具有政治家的巨大影响力，能够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方案变成区域、国家的教育实践。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呼唤教育家的时代的话，最为迫切的呼唤应该是对此类教育家的呼唤。因为此类教育家对于整个教育思想“地形图”的变化、教育实践格局的转型，具有全局性影响，是塑造整个时代教育大势，对教育变革影响深远的人物。从张之洞的成长历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这一类型的教育家成长的规律。这对于我们当代造就这样的教育家，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。下面，我们就一起进入“历史的深处”，探寻张之洞成长为政治家型教育家的机制。



## 第一章

# 教育家人格：献身教育事业的不竭动力

张之洞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家型教育家，与其诸多人格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正是这些人格的萌芽与生长，为张之洞成为教育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，使之克服种种艰难困苦，力推其教育思想与实践跃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境界，终至成为教育大家。就其要者而言，以下几方面的人格是非常重要的。

## 第一节 对教育事业的挚爱

张之洞对教育事业的挚爱，可以从其一生事功的很多重要节点上看得很清楚。下面，我们就一一进行考察。

湖北学政是张之洞一生事功的起点。在这一起点上，其对教育事业的挚爱已经露出头角。1867年8月，张之洞被委任为湖北学政后<sup>[1]</sup>，连被誉为“人间天堂”的杭州都没有过多

[1] 学政，全称为“提督学政”。清廷设此职，派往各省掌生员之考核黜陟，称为案临。任职者，从进士出身的侍郎、京堂、翰林、科道等官中简派，三年一任。任学政期间，不问本人官阶大小，均与督、抚平行。

停留，只是匆忙看了几个景点，就急急忙忙打点行装，溯江而上，到武昌上任了。按照官场惯例，官员到任后，要向皇帝上呈到任奏疏，张之洞当然也不可能免俗。上任伊始，他便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呈上了自己的奏疏。在奏疏中，张之洞直抒自己的施政主张：“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，而在培养平日之根柢；不仅以提倡文字为事，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。”由此可见，张之洞给自己的职责定位，重要的不是完成国家规定的考量学生学业的任务，而是以考核为手段，培植学生的学术根底与砥砺学生的品行。对于这一点，张之洞在敬告诸生的文告中说得更为明白：“剔弊何足云难，为国家培养人才，方名称职。衡文祇是一节，愿诸生步趋贤圣，不仅登科。”<sup>[1]</sup> 在这里，他明确指出，作为一个称职的学政，其职责不仅是考量学生的文章，驱使其入仕，而且要把作育人才、使之成为圣贤坯子，放在更重要的地位。这是真正学有所本且具备育才情怀的官员才可能有的追求。

怀着量才与育才并重的雄心，张之洞先后两次按试德安、汉阳、黄州、襄阳、郧阳、安陆、荆州、宜昌、荆门等地，主持湖北乡试。其间，“以端品行、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”诸生。这充分说明，张之洞是一个知行合一、尽职尽责的学政。为了最大限度地为国家培养、选拔人才，张之洞除了按照朝廷规制尽自己作为学政的职责外，还推动了一系列兴革举措。如其为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，“札行各属，发题观风，听生童量能自占，各尽所长。引用隐僻典实，许自注书名出处。平日具

---

[1] 吴剑杰编著：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（上卷）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33页。

有著作者，可随卷送呈。”他还奏请朝廷，将以往一刀切的“经文”考试改为“经解”，由考生自己上报平日研习的经书，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考察。当然，其中影响最大、影响最为深远者，还是经心书院的创办。

经心书院的创办，缘于张之洞对作育人才的关注。1869年，张之洞在视察江汉书院后，深感该书院规模太小，不足以培养更多的人才。于是，张之洞就约见时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的李鸿章，提议在武昌别建精舍。对于此事，李鸿章深表赞同。虽然当时的湖北在经济上并不宽裕，李鸿章还是在武昌火星堂文昌宫拨款修建了一所书院。该书院初名文昌书院，后改名为经心书院。张之洞“别学舍为经义、治事，选各府尤异者得数十人，俾读书其中”。<sup>[1]</sup> 书院第一任山长为刘恭冕。<sup>[2]</sup> 课程有经解、史论、诗赋、杂著等。书院开办之初，吸收了许多人才入院深造。据说，当时的“札调咨送入院而不得住院者尚有二百数十人”<sup>[3]</sup>，可见育才数量之众。对于书院中的优质高材者，张之洞青睐有加。当贺人驹、陈作辅、傅廷浩、范昌埭四名高材生病故时，张之洞曾作诗《四生哀》，表达其哭悼之情。自此，我们不难看到其为国育才、惜才的情怀。

正因为张之洞在湖北学政任上为国事呕心沥血，颇多实绩，故颇得时人的好评。如曾国藩就曾这样赞许：“往时祁文

[1] 胡钩：《张文襄公年谱》，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，第32页。

[2] 清代著名经济学家《论语正义》作者刘宝楠之次子，曾经在曾国藩建立的江南书局任主持人之一，于1866年续成其父著作并刊印。

[3] 苑书义等主编：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2册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789页。

端、张海门视学吾乡，最得士心，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。”<sup>[1]</sup> 1870年春天，在发妻辞世五年后，张之洞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之女为妻<sup>[2]</sup>。1870年10月，湖北学政任满，张之洞在交卸学篆后，携唐夫人返京。当时作有《送妹亚芬之黔》一诗，其中写道：“人言为官乐，哪知为官苦，我年三十四，白发已可数。”<sup>[3]</sup> 可见其在学政任上的呕心之状、劳苦之态。不过，为官一任，能够得到士林魁首“得士心”与“惬众望”这样的考语，也就不枉其任上的殚精竭虑了。

1873年9月，张之洞被任命为四川学政。四川幅员辽阔，多崇山峻岭，交通不便。对此，张之洞心知肚明。因此，在还未上任时，他便预感“此差殊非乐境”。不过，张之洞并没有因此而退缩，而是一如既往，每年到各个州府巡视、督察。虽然陆路“大率荒山绝壁，盘路一线，险不可言”，水路“处处皆滩，惊心动魄，绝无从容怡旷之地”<sup>[4]</sup>，张之洞依然奔波于巴山蜀水之间，不假稍歇。据赵尔巽说，张之洞在学政任上，“平日衡文不主一格，凡有一艺之长，无不甄录，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柢之学，故所至考求文献，礼访名宿，惟恐不及，每值士人晋谒，辄优假颜色，殷殷焉以读书稽古相敦勉，并为指示途径，俾有遵循。”<sup>[5]</sup> 对于确实有才华的士子，张之洞则

---

[1] 吴剑杰编著：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（上卷）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35页。

[2] 两年后，唐夫人病卒，留下一子仁颐。

[3] 吴剑杰编著：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（上卷）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38页。

[4] 菡书义等主编：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12册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0123页。

[5] 王树枏编：《张文襄公全集》，北京文华斋1928年刻本，卷首上。

特别加以栽培。如张之洞就曾把绵竹籍学生杨锐（1857—1898）<sup>[1]</sup>、仁寿籍学生毛席丰、华阳籍学生范溶等高才生“召之从行读书，亲与讲论，使研经学”<sup>[2]</sup>。因此，四川一地的学风为之大变。张之洞去世后，四川总督赵尔巽曾上章盛赞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实绩：“先是川省僻处西陬，人文未盛，士林之所驰鹜，率不出帖括章句之图。自同治初年该大学士（即张之洞——引者注）典试西来，始拔取绩学能文之上……以为之倡，士风始为一变。”<sup>[3]</sup>这一评价应当说是甚为公允的。

为了给四川作育更多的贤才，在学政任上，张之洞还办学颇费心力。成都原来设有锦江书院，但规模很小，难以广纳英才而育之。对此，张之洞忧心不已。他多次面见当时的四川总督吴棠，仔细商酌书院创办事宜。在吴棠的鼎力支持下，倾力创办尊经书院。1875年春天，尊经书院终于建成。尊经书院建成后，张之洞参照诂经精舍、学海堂的学规，提出“建置书院之本义与学术教条之大端”共十八条，作为尊经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。然后“择郡县高材人百人肄业其中，延聘名儒，分科讲授”。<sup>[4]</sup>考虑到成都地处边地，购书不易。张之洞捐出自己的薪俸，购置四部书籍四千卷，专门建造尊经阁收

[1] 张之洞称杨锐：“才英迈而品清洁，不染蜀人习气。颖悟好学，文章雅赡，为‘蜀士一时之秀’。”（《全集》卷二百八十二，书札一，《致谭叔裕》）。二十年后，杨锐以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而身陷囹圄，之洞为之多方奔走，营救未果，深为痛心。

[2] 吴剑杰编著：《张之洞年谱长编》（上卷）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49页。

[3] 王树枏编：《张文襄公全集》，北京文华斋1928年刻本，卷首上。

[4] 胡钩：《张文襄公年谱》，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，第38页。

藏，供书院士子阅读。在处理政务的余暇，还“莅院为诸生解说”。<sup>[1]</sup>为尊经书院，张之洞可谓倾尽心血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张之洞在离任后，还对该书院充满眷眷之情。1876年1月8日，张之洞在返回京城的路上，致书给其继任者、友人谭宗浚。在信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身虽去蜀，独一尊经书院，惓惓不忘。此事建议造端，经营规划，鄙人与焉（根柢浅薄而欲有所建立，诚知其妄）。今日略有规模，未臻坚定，章程学规，俱在精鉴（章程有稿存案，书院记即学规）。斟酌损益，端赖神力。他年院内生徒，各读数百卷书，蜀中又通经学古者，能得数百人，执事之赐也。”<sup>[2]</sup>可见，张之洞虽然离任学政一职，但是，对于尊经书院，还满怀眷恋之情、期望之心。如果不是对培育人才情有独钟者，何能臻此？

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后，履任时间不长，张之洞便上呈《整饬治理折》，向最高统治者上奏自己的“治晋之道”。其中，张之洞即针对山西“士气衰微而废其学”的状况，提出了“培学校”“重士以善俗”<sup>[3]</sup>的设想。为了落实这一设想，在1882年到1884年间，张之洞专门拟定《咨学院筹商学校事宜》<sup>[4]</sup>，除了要求“除行两司、四道、清源局转饬各属一体遵照分别筹议举办外”，还要求学政“酌核施行”。该公文包括“减社钱以广义学”“筹经费以修书院”“去棚费以汰积

[1] 胡钧：《张文襄公年谱》，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，第39页。

[2] 苑书义等主编：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12册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0129~10130页。

[3] 苑书义等主编：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1册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101~102页。

[4] 苑书义等主编：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4册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2401~2404页。

弊”“免差徭以尊学校”“重岁贡以劝来学”“戒鸦片以作士气”“核教官以端表率”“裁陋规以恤寒素”“清学田以复旧章”“整武校以资练习”十条。从这一公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张之洞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对山西的传统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与提升。虽然由于张之洞任职山西时间不长，有很多举措没有来得及落实，但是，在推动山西教育兴革上，还是留下了值得圈点之笔，如令德书院的创办。

张之洞到任时，山西省城太原便设有晋阳书院。时任学政的王学庄甄选高材生50人于其中，一心研习古学。张之洞到任后，考虑到书院太过狭小，难以广育人才，就与王学庄会商，准备在太原府衙西边的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，另外重建一所书院。书院建制拟仿照阮元的话经精舍、学海堂的成例，名为“令德堂”。不料，后来王学庄、丁忧去职，张之洞只能与新任学政吕凤歧再次悉心筹划。后来，终于在桥头街将“令德堂”开办起来。

初创时期的“令德堂”，由洪洞县人王轩<sup>[1]</sup>为主讲，闻喜县人京卿杨深秀<sup>[2]</sup>、乡宁县人杨笃<sup>[3]</sup>为襄校。王轩精通传统的朴学与地理学，杨深秀精通今文经学，杨笃则精通算学、史学、地理学。因此，在令德堂中，其讲学、研究活动不囿于一家之学，而是汉学与宋学并重、中学与西学兼有。书院“五日一会，讲者翕然”，足见其学术氛围之浓厚。“文章轨辙不为俗学所囿”，更是直承中国传统书院自由讲学、研究的优良传统。在这样一个百家争鸣、中外交融、自由研究的环境中，

[1] 字霞举，自号顾斋，同治壬戌进士。

[2] 字漪村，光绪丁丑进士，后来的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。

[3] 字巩同，号秋湄，同治甲子举人。

许多学子成长起来，成为山西的“通省人才”。

作为统管全省方方面面事务的巡抚，不仅对教育的兴革全面规划，还为令德书院的筹办倾心尽力。如果不是一个对教育事业别有幽怀的人物，不可能这样去做。

1884年7月，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。在两广总督任上，张之洞特别注意到，“泰西各国，莫不各有水师、陆师学堂”。因此，他火速向朝廷上呈《创办水陆师学堂折》。在这一奏折得到朝廷的允准后，1887年8月，张之洞开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。

作为一个有着战略眼光的教育家，张之洞不仅对直接关乎国运的军事教育特别重视，对于其他方面的教育，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。这一点，从其在上呈《办理水陆师学堂情形折》的同时，还附上《增设洋务五学片》可以得到确证。在这一附片中，张之洞如此奏请朝廷：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添设矿学、化学、电学、植物学、公法学5所西艺学堂，各招生30名，总计招生数为150名。拟托出使英国大臣刘瑞棻，分别延请赫尔伯特教授公法学，葛路模、骆丙生、巴庚生分别教授植物学、化学和矿学。后经朝廷允准，于1889年11月10日，水陆师学堂正式增设矿学、化学、电学、植物学、公法学等五所西艺学堂。这五所学堂被称为“洋务五学”。

张之洞在对西方教育学习与模仿的基础上，推出了一系列创造性举措，让世人对其刮目相看。不过，在教育兴革上，张之洞并非一味倡导西方教育的推行，而是在承接创办经心书院、尊经书院和令德堂书院的余绪，对于传统教育的改造，也倾注了大量心力。1887年5月，在张之洞的筹划、督责下，广雅书院得以创办。1887年7月，张之洞拨专款，增修学海



堂的斋舍，并为之增广学额、加强教学和考课。1888年3月，张之洞集中精力整顿端溪书院，为之改订课程，把时文和经史古文之学都列入课程。1889年2月，在张之洞的督促下，建成北江书院。1889年3月，还为粤秀书院、越华书院改订章程。

总之，在成为全面负责军政、民政事务的封疆大吏之后，张之洞依然对创办西式学堂、筹办书院费尽心力。不仅在办学活动的宏观规划上思虑周详，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上也多亲力亲为。只有对教育事业满腔挚爱者，才能至此。

1889年11月，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。在湖广总督及暂署两江总督期间，除了兴办各种实业外，其声名卓著、影响巨大者，即是开办新式学堂。在其创办的一系列新式学堂中，储才学堂是最为显著者。

储才学堂的专业分为交涉、农政、工艺、商务四大门类。在这四大门类的专业中，分别设置若干课程。如交涉之学下设课程为律例、赋税、舆图和翻书；农政之学下设课程为种植、水利、畜牧、农器；工艺之学下设课程为化学、汽机、矿务、工程；商务之学下设课程为各国好尚、中国土货、钱币轻重、各国货物衰旺。如果从现代学科分类的眼光来看，这些专业、课程设置的方式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，但是，如果抛开其分类合理与否这一问题，我们粗略地来看，这些专业大类与课程涉及的都是涉外、农业、工业、商业等与国家富强关系密切的事业。就此而言，这一学堂是农学、工学、商学、法学、语言等专门学堂的集成。其综合性、完备性是张之洞以往创办的任何学堂都不具备的。

由于张之洞痛感中国陆军军官素质低下对军队战斗力的制

约，向朝廷呈上《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》，提出创办陆军学堂与铁路学堂的设想。在得到批准后，陆军学堂得以在南京仪凤门内和会街创建。

对于创办陆军学堂的宗旨，张之洞的设想是，借鉴德国经验，造就国家需要的将才。对此，张之洞是这样说的：“窃维整军御侮，将材为先。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，固由其全国上下无一不兵之人，而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，故得人称盛。今欲仿照德制训练劲旅，非广设学堂，实力教练，不足以造就将才。”<sup>[1]</sup> 陆军学堂的专业设置分为马队、步队、炮队、工程队、台炮五大类。

在创办陆军学堂的同时，张之洞正在筹划建设卢汉铁路，铁路建设人才是其急需。因此，张之洞在奏请设置铁路学堂的奏折中说：“中国方经营铁路而人材缺乏，势必多用洋人，费且不赀，是非亟备人才不可。”<sup>[2]</sup> 另外，张之洞考虑到“铁路一项学有专门，与陆军尤相关系”，还提出把铁路学堂设在陆军学堂里的奏请。这些奏请都一并得到批准，于是，铁路学堂就附设在陆军学堂内，开办起来。

对于农学之于富国利民的重要性，早在张之洞任职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时，便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。否则，张之洞就不会在任职两广时在“洋务五学”中设立农学，也不会在储才学堂中设立农学一门。不过，在任职湖广的中期之前，张之洞对农学重要性的认识还是肤浅、片面的。到了 1896 年至 1897

[1] 苑书义等主编：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 2 册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089 页。

[2] 苑书义等主编：《张之洞全集》（第 2 册），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090 页。